

雕版印刷：宋代杜詩傳播不容忽視的因素

張錦輝

[提要] 雕版印刷術作為活字印刷術的前身，在我國印刷史上有著獨特而重要的地位。雕版印刷術繁榮於右文崇儒之宋代，其產生既有利於書籍的保存，同時也加速了傳播的進程。在雕版印刷術的影響下，宋代印書不僅呈現出官刻、私刻、民間刻書三大刻書系統，而且還呈現出刻書地域廣、雕印書籍數量與種類多、雕刻書籍內容相對集中等特點。雕版印刷術在宋代取得了空前的發展，直接改變了以口語和手抄為主的傳統文學傳播方式，進入以雕印為主的文學傳播新時代。杜甫的詩歌在宋代雕版印刷的直接推動下煥發出新的生機，出現了“千家注杜”的繁榮局面，形成了杜詩傳播接受史上的第一次高潮。除了杜詩本身獨特的藝術魅力和豐富的思想內涵外，雕版印刷術對於宋代杜詩傳播也起到重要作用，並為杜詩在宋以後的傳播乃至清代出現第二個高峰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成為杜詩傳播史上不容忽視的因素。

[關鍵詞] 雕版印刷 杜詩 傳播

[中圖分類號] I20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7) 02 - 0157 - 07

雕版印刷術繁榮於右文崇儒之宋代，其對促進書籍保存、文學傳播發展所起之用，正如張高評先生所言：“雕版印刷之崛起與繁榮，所觸發之圖書流通、知識傳播效應，是宋代文明登峰造極之推手，是宋型文化孕育之功臣，是宋詩特色形成之中介，是‘詩分唐宋’之重要觸媒，是‘唐宋詩之爭’公案中之關鍵證人。”^①本文擬在梳理雕版印刷發展概況的基礎上，對以抄寫為主的唐代杜詩傳播和以雕印為主的宋代杜詩傳播進行比較，進而探討雕版印刷對宋代杜詩傳播的影響。

—

雕版印刷術作為活字印刷術的前身，在我國印刷史上有著獨特而重要的地位。其產生於何時，自宋代之後就眾說紛紜，難有定論，先後出現了諸如“東漢說”、“晉代說”、“六朝說”、“隋代說”、“唐初說”、“唐中說”、“唐末說”、“五代說”等觀點。^②目前學術界較為一致的看法是，雕版印刷術的產生不晚於唐代。

“任何一項新技術的產生，都必須具備兩個前提，一是當時社會對這項技術的強烈要求；二

是產生這種新技術的可能，包括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兩個方面，而在中國的隋唐之際，這幾方面條件均已具備”。^③在物質方面，產生於漢代的造紙術，經過魏晉南北朝的不斷完善改造，到了唐代，紙的質地已明顯提高；筆和墨經過漫長的演進，至唐代也已發展得相當成熟。捶拓、印花、印章等技術的成熟和完善，為雕版印刷術的出現提供了技術方面的保障。從現存唐代雕印書籍看，其內容主要以佛經和曆書為主，其次也有術數、小學、字書等書籍。刻書主要集中在長江流域，即上游的“劍南兩川”，中游的“江南西道”和“淮南道”，下游的“揚越間”地區，其中以成都雕印書數量最多。除了寺院刻書外，大多書籍出自民間坊刻。

到了五代，雖然整個中國局勢動盪不安，政治混亂，但是雕版印刷業與唐朝相比，卻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首先是刻書地區的進一步擴大，除了唐代的長江流域外，五代時北方的青州，南方的福州，甚至西北的瓜洲、沙洲也開始刊刻書籍。其次是刻書者的變化，出現了私人刻書和官府刻書，刻書開始從民間走向上層的統治階級。最後是刻書內容，除了刊刻佛經外，儒家的經典著作此時也被大量刊刻，一些文集和類書也開始刊刻。總之，雕版印刷術在唐代處於起步階段，書籍刊刻主要集中在某一地區，而且刻書內容單一，主要以佛經和曆書為主，雕版印刷術並未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和使用。五代刻書較之唐代，呈現出新的特點，是雕版印刷術由萌芽走向興盛的關鍵階段。

雖然趙宋王朝自建國伊始就不斷受到外族政權的侵擾，但是它的發展卻令人吃驚，“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程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④其所創造的精神文明更是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據著重要地位，“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⑤文化的傳播離不開書籍，書籍產生的形式有兩種，抄寫和印刷，而大範圍的文化傳播只能採取印刷的形式。產生於唐代的雕版印刷術發展到宋代，可以說是繼五代戰亂之後我國刻書史上的又一個輝煌時代。它在兩宋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最終促進了文化的傳播。

雕版印刷歷經唐、五代，“精於宋人”，^⑥在宋代取得了空前發展。《書林清話敘》指出：“書籍自唐時鏤板以來，至天水一朝，號為極盛。而其間分三類：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⑦在雕版印刷的影響下，宋代印書不僅呈現出官刻、私刻、民間刻書三大刻書系統，而且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刻書地域廣。在宋代，無路不刻書，幾乎各縣府（州、軍、監）都刻印過書籍。北宋刻書之地，可考者不過三十餘處，而到了南宋，據統計共約一百八十處，其中以兩浙東西路四十八處為最多，其次是江南東西路三十六處，荊湖南北路二十七處，福建路二十二處，淮南東西路，四川路各十八、九處，最後為廣南東西路。^⑧在當時形成了汴京、福建、江浙、四川等大的刻書中心，在它們的帶領下，甚至在所謂煙瘴之地的柳州以及孤懸於海外的瓊州，也發現刊有《初虞世必用方》，可見在當時雕版印刷已非常普及。這樣，兩宋刻書地域便形成一個網狀分佈，可謂點面結合。

其次是雕印書籍數量，種類多。經濟的發展為雕版印刷提供了雄厚的物質保障，加上雕刻技術在宋代的成熟，故當時刊刻圖書的數量非常可觀。據估計，“宋代刻本當有數萬部，明權相嚴嵩家被抄時，中有宋版書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傳至今日，國內外所傳不過一千部左右，內台灣約存二百部，又多為殘本或複本”，^⑨可見宋代刻書數量之多。我們也可從《宋史·藝文志》所記載書目、卷數的規模，窺探當時刻書之數量：

宋初有書萬餘卷……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零六部，兩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⑩

除了雕刻數量眾多之外，宋代雕刻書籍的種類也很齊全，經史子集無所不包，甚至一批關注民生的書籍，如《黃帝內經素問》、王叔和《脈經》、《圖經本草》等醫書，《考古圖》、《金石錄》等金石書，《齊民要術》等農書，《夢溪筆談》等科技書，在宋朝也被大量刊刻。

最後，宋代雕刻書籍內容相對集中。雖然宋代雕印書籍種類繁多，但總體來看，刊刻的內容主要還是以經史為主，兼刻文集、醫書。之所以在內容上形成如此偏重，首先就在於經史著作有利於維護封建統治，而醫書的刊刻則是由於宋朝皇帝對醫學的重視；其二是利益的驅動，這幾類書令書商獲利頗豐，因為經史等書是讀書人考取功名必不可缺的工具，而醫書則是百姓汲取醫學常識的載體，直接關係到民生。

文化的傳播離不開書籍，書籍在當時產生的形式主要有兩種，抄寫和印刷。抄寫不僅費時費力，而且還需要花費大量資金。雕版印刷在宋代取得了空前的發展，“不只造成圖書複製技術之巨大變革，更形成知識信息傳播在質量方面的快速衝擊”，^⑪直接改變了傳統以口語和手抄為主的文學傳播方式，^⑫進入了以雕印為主的文學傳播新時代。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詩歌，在宋代雕版印刷的直接推動下煥發出新的生機，促成了宋代杜詩“千家注杜”繁榮局面的出現。

二

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杜甫有著重要的地位。清人葉燮說：“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甫有其胸襟以為基。如星宿之海，萬源從出；如鑽燧之火，無處不發；如肥土沃壤，時雨一過，禾稼百物，隨類而興，生意各別，而無不具足。”^⑬聞一多稱杜甫為“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⑭杜甫之所以獲得如此殊榮，一方面在於他作品思想內容的博大、藝術手法的精妙，另一方面在於他作品的廣泛傳播。正如胡可先所說，“杜詩的地位被確定過程，就是在他的當代和後代被不斷傳播，不斷學習，不斷接受的過程”。^⑮以下分別對以抄寫為主的唐代杜詩傳播情況和以雕印為主的宋代杜詩傳播情況進行論述。

（一）唐代抄寫中的杜詩傳播

在唐代，雕版印刷術雖然已經產生，但文學作品的傳播主要還是依靠抄寫的方式。杜甫詩歌在唐代的傳播主要有兩種途徑：

一是通過杜甫與同時代和後輩詩人的交往。如他與同輩詩人高適、岑參、王維、王翰、嚴武、郭受、韋迢、李邕、魏啓心等彼此間皆有寄贈，其中不少詩歌都流傳下來。任華在《寄杜拾遺》開頭寫道：“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別，別來已多時，何嘗一日不相思。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為”。^⑯由此可見杜詩在當時傳播的情境。除此之外，一些詩人還直接化用杜詩，如中唐詩僧皎然在其《詩式》中曾引用杜甫《哀江頭》二句：“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⑰

二是通過抄寫的方式傳播。杜甫死後，作品主要靠文集和一些詩人編的選本流傳。唐人樊晃在《杜工部小集序》中說：“《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常蓄東遊之志，竟不就。屬時方

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為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類，分為六卷，且行於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⑩從樊晃的記述中，我們可知杜甫死後，他的文集傳播範圍非常有限，像樊晃這樣專門編次杜集，多方搜求，也沒有得到六十卷杜甫文集，只能是採其遺文二百九十篇，編為《小集》六卷，那麼其他人要想見到杜詩則更是不容易。所以杜詩的地位在當時不能與李白、王維相並稱，也是情理之中的。

詩選在唐代層出不窮，大約有五六十種之多，目前可見者尚有十餘種，然而收錄杜詩且至今仍然流傳的唐詩選本只有韋莊所編的《又玄集》（編於唐昭宗光化三年），裡面收錄杜詩七首，分別是《西郊》、《春望》、《禹廟》、《山寺》、《遣興》、《送韓十四東歸覬省》、《南鄰》。而在那些已經散佚的選本中，收錄杜詩的有顧陶的《唐詩類選》。該書雖已亡佚，但是顧陶所寫的《唐詩類選序》和《唐詩類選後序》卻在《文苑英華》和《全唐文》中可見，從中可以窺探出顧陶作《唐詩類選》的目的和宗旨。基於顧陶的詩學觀，書中表現出了鮮明的尊杜傾向：“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挺身於前，群才莫得而並……得蘇李劉謝之風骨，多為清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僞流艷之辭，宜矣。”^⑪其所收錄的杜詩，經過胡可先的考證，認為選杜詩達二十九首。^⑫有學者認為，杜詩在當時沒能獲得廣泛傳播，與其選本有限有相當大的關係。在當時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的是殷璠的《河岳英靈集》、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和韋毅的《才調集》。這幾個選本皆未收錄杜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杜詩的傳播。

除選本外，別集的編纂也是詩人保存傳播作品的重要方式，而編纂主要採取的就是抄寫的形式。抄本雖然起到保存文集的作用，但卻不能有效地傳播，因為抄寫費時費力費資金，最大的弊端就是抄寫數量有限。因此，唐人別集編撰完後，一般是繕寫幾本，然後借人傳抄，這樣便於流傳。例如白居易曾在晚年親手將自己的文集精心抄寫五本，藏於不同的地方，而且還規定了借人傳看的要求，這無疑對作品的保存和傳播起到了促進作用。相比之下，杜甫則沒有白居易這樣幸運，他一生身處亂世，貧窮饑困，既沒有達官貴人提携，也沒有條件整理編輯自己的詩文。到了晚年，生活更是淒慘，連下葬都成問題，哪裡還有餘力去顧及詩歌的抄傳？所以，杜詩保存傳播過程可謂艱辛。《新唐書》杜甫本傳記“甫有集六十卷”，^⑬《新唐書·藝文志》也著錄“杜甫集六十卷”，^⑭可是實際情況遠非如此。

以上是杜甫詩文在唐代傳播的概況，由於諸因素的影響，杜甫詩文的傳播受到一定限制，以致韓愈發出了“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的感慨。加之又經過唐末五代的動亂，所以到了宋初，杜詩出現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次矣”^⑮的情形。

（二）宋代雕印中的杜詩傳播

到了宋代，對杜詩先後進行編集的有王洙、蘇舜欽、劉敞、王安石等人。王洙於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匯集各種抄本，最終整理校訂為二十卷，他在後記中說：“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敘矣。搜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與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卷，合二十卷。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圖益諸。”^⑯從此後記中，我們不難看出杜詩自中唐至宋初間所呈現的諸般不同面目。在王洙之後，對杜詩進行整理的

是蘇舜欽，他於景佑三年（1096）編纂《杜甫別集》，在《題杜子美別集後》中寫道：“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在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為近世所尚，墜逸過半，吁！可痛憫也！天聖末，昌黎韓綜官華下，於民間傳得號《杜工部別集》者，凡五百篇。予參以舊集，削其同者，餘三百篇。景佑初僑居長安，於王緯主簿處又獲一集。三本相從，複擇得八十餘首，皆豪邁哀頓，非昔之攻詩者所能依倚，以知一出於斯人之胸中。念其亡去尚多，意必皆在人間，但不落好事家，未不耳。今以所得，雜錄一策，題曰《老杜別集》，俟尋購僅足，當與舊本重編次之。”^⑨由此可以看出，蘇舜欽所編撰的應該是杜甫詩集的新版本，可惜在當時並未能廣泛流傳，現在也亡佚不存。與王洙時代相當的劉敞也曾對杜詩進行編纂，編成《杜子美外集》五卷，在《公是集》卷二四有《編杜子美外集》一詩，題下注：“先借王《杜甫外集》，會疾未及錄。近從吳生處借本，增多於王所收，因悉抄寫，分為五卷，又為作序，故報之”。劉敞所編《杜子美外集》，後來的注家沒有人徵引，所以在當時也是沒能廣泛流傳。皇佑五年（1052），王安石編成《杜工部詩後集》，他在《老杜詩後集序》稱：“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之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⑩杜集雖然有諸多版本，但是只有嘉佑四年（1059）蘇州鏤板刊印王洙所編《杜工部集》時，杜詩在當時才廣泛傳播。范成大《吳郡志》載曰：“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即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每部為值千錢，士人爭買之。”^⑪可知杜詩一刊印便廣泛傳播，以致後來所有杜詩亡補遺本、增校本、注釋本、分類本、評點本、編韻本等，無不以此本為祖。目前所知宋代所刻杜詩如表 1：

表 1 宋代所刻杜詩

名稱	卷數	典藏地	備注
杜工部集	二十卷，《補遺》一卷	上海圖書館	清毛扆跋
草堂先生杜工部集	二十卷	杜甫草堂	
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	二十五卷	國家圖書館	宋趙次公等注，存六卷
門類增廣集注杜詩	二十五卷	國家圖書館	宋趙次公等注，存一卷
分門集注杜工部詩	二十五卷，《年譜》一卷	國家圖書館	宋呂大防、蔡興宗、魯山言撰，趙次公等注
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	三十二卷	蘇州市圖書館	題宋王十朋集注
杜工部草堂詩箋	五十卷	國家圖書館	宋蔡夢弼箋注，存四十三卷
杜工部草堂詩箋	五十卷	北京大學	佚名校
杜工部草堂詩箋	五十卷	杜甫草堂	存二十二卷

資料來源：據胡可先《杜詩學引論》附錄二。

在雕版印刷術的支持下，宋代杜詩出現所謂“千家注杜”的局面並非誇張之談。這加速了杜詩的傳播，最終形成了杜詩傳播史上的第一個高峰。另外，據張秀民《中國印刷史》，可考的宋版杜甫詩集還有如下：嘉佑四年姑蘇那齋刻本、治平中裴集刊本《杜工部集》、建安府刻本《杜工部詩》、淳熙八年成都刻本、寶慶六元廣東漕司刻本、紹定四年本《九家集注杜詩》。

三

英國學者李約瑟曾說：“我認為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沒有比紙和印刷的發明更重要了。”^⑧ 雕版印刷術作為活字印刷術的先驅，其對人類文明進步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杜詩在宋代獲得新的生機，形成傳播史上的第一次高峰，與雕版印刷是分不開的，其對杜詩傳播的推動作用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雕版印刷對宋代出現“千家注杜”繁榮局面起到直接的推動作用。自嘉佑四年王洙、王琪本杜集刊行後，杜詩開始大行於世，其後宋代杜詩的各種選本、編年本、注釋本、集注本、分類本、評點本等層出不窮，使杜詩在宋代得到最廣泛的傳播。而這除了與杜詩自身的獨特魅力和宋代知識階層的社會心理等因素外，雕版印刷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因為雕版印刷的原理在於制一次版可以反復印刷，這就比專門用人手抄節省了大量時間，而且還可以避免出現錯誤。只需把最初的刻板保存好，便隨時可以刊印，正是有了這種便利的條件，杜詩的各種版本才會層出不窮，例如《補千家注杜工部詩史》、《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等。

其次，在於保存杜詩。在抄本時代，一個作家的作品要想保存只有通過抄寫的途徑，雖然起到保存作品的目的，但由於在抄寫過程中費時、費力、費金，且數量有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書籍的流通和傳播。雕版印刷雖產生於唐代，“然隋唐之時，雕版之法，僅屬萌芽，尚未大行。故唐人之書，率皆寫為卷軸，而印刷成冊者流傳甚稀”。^⑨可是進入宋代，情況則大不相同，一部作品往往刻印上千部，既起到保存的目的，也加速了其傳播的進程，杜詩即是如此。

最後，為杜詩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杜詩學”名稱始見於金人元好問的《杜詩學引》，《杜詩學引》首先表明了對宋人注杜的看法。唐以來注解杜詩者有六七十家，發明奧隱者不可謂之無功，但旁引曲證反成蕪累者亦復不少。宋人注杜在當時已號稱千家，對杜詩字句典故的考證箋釋、對詩義的闡發挖掘等有開拓之功，成就斐然。趙次公注乃其中最精者。但宋人注杜好逞博炫奇，空虛無據之言、委曲雜亂之語充斥其間，尤其坊賈唯利是圖，作偽者甚多，又為後人留下辨偽清理的諸多麻煩，偽東坡注是其中最為誤人者。其次，《杜詩學引》最為精到的是指出杜詩之妙在於“學至於無學”。杜詩向以“無一字無來處”、集古今之大成著稱。元好問在指出杜詩這個最主要的特徵後，先用一系列的比喻讚美杜詩達到的高妙境界：能隨物賦形，於自然天成中表情達意；能融會眾家，調動百端；能富於變化，不落俗套，乃古人之精華浸潤而成。接著又以藥劑為喻，藥能指名，合而為劑，則不復可名，表明杜詩化用古人亦已達此難分彼此的境界，其使用故事，更是冥合無跡，一片天機。^⑩總之，在元好問看來，“杜詩學”的興起與宋代出現的“千家注杜”和諸多杜詩版本的出現是分不開的，可以說是以杜詩輯注之學為其根柢，以杜詩譜志之學為其線索，以唐、宋、金諸家論杜為其參照，宋代雕版印刷大量刊印的杜詩集，為“杜詩學”的奠基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在雕印技術的推動下，宋代文學呈現出獨特的風貌。正如朱迎平先生所言：“傳統的文學史研究，都將唐宋時期作為古代文學發展的高峰劃為同一個階段。其實，唐代文學與宋代文學還是有著各自鮮明的特色，而造成這種區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唐代仍處於中國文學的寫本時代，而宋代則開啟了中國文學的刻本時代。”^⑪足見雕版印刷在宋代文學發展中的作用。雕版印刷技術的興盛和文集的大規模刊刻，對宋代文人作品的傳播途徑、傳播地域，甚至一些文學流派的形

成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杜詩在宋代之所以被廣泛接受和傳播，除了杜詩本身的藝術魅力和思想內涵外，與宋代知識階層的社會心理也是分不開的。然而，如果沒有杜詩被大量的刊刻，其傳播範圍則非常有限，所謂的“千家注杜”局面恐怕也難以出現。由此可見，雕版印刷對杜詩在宋代形成傳播接受史上第一次高峰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為宋以後形成注杜、評杜等傳播接受高潮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成為杜詩傳播接受史上不容忽視的因素。

- ①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與傳媒效應》，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
- ②參見曹之：《雕版印刷起源說略》，見《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一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86～193頁。
- ③肖東發：《中國印刷圖書文化的起源》，《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一卷，第196～220頁。
- ④鄧廣銘：《關於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長春：《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2期。
- ⑤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245頁。
- ⑦葉德輝著，李慶西標校：《書林清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頁。
- ⑧⑨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3～94、58頁。
- ⑩脫脫等撰：《宋史》卷二〇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5033頁。
- ⑪張高評：《宋代印刷傳媒與詩分唐宋》，南昌：《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 ⑫叢衆先生將中國文學的傳播劃分為口語文學傳播、抄寫文學傳播、雕版印刷文學傳播和活字印刷文學傳播時代。參見叢衆：《傳播學視野中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哈爾濱：《黑龍江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 ⑬葉燮著，霍松林點校：《原詩·內篇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17頁。
- ⑭聞一多：《杜甫》，見《杜甫研究論文集》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⑮胡可先：《杜詩學引論》，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26頁。
- ⑯彭定求等校點：《全唐詩》卷二六一，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2903頁。
- ⑰《綠窗新語》卷九引《詩式》，今本《詩式》無。
- ⑱⑲⑳㉑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附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237、2240、2240、2242頁。
- ㉒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七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3686頁。
- ㉓詳見胡可先：《杜詩學引論》第二章《杜詩學史論》第二節“唐人書目所見杜甫詩輯目”。
- ㉔劉昫等撰：《舊唐書·杜甫傳》卷一九〇，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057頁。
- ㉕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藝文志》卷六〇，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603頁。
- ㉖沈文倬校點：《蘇舜欽集》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1～172頁。
- ㉗李之亮箋注：《王荊公文集箋注》卷四七，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第1619頁。
- ㉘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冊，《紙和印刷》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頁。
- ㉙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53頁。
- ㉚參見姚莫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卷三六，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50～751頁。
- ㉛朱迎平：《刻書產業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頁。

作者簡介：張錦輝，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哲學系博士後研究人員。西安 710119

[責任編輯 桑海]